

《沉重的翅膀》的“沉重”修改

苏奎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摘要:《沉重的翅膀》自1981年在《十月》第四、五期连载发表,到1984年出版单行本,作者张洁对其一共进行了三次修改。虽然没有“伤筋动骨”的变动,也没有“面目全非”,但是这种改写本身就体现出了社会转型期文学批评的特色。张洁的改写确有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然而更多的还是来自政治批评的压力,这使得表达中国人变革梦想、预见历史潮流趋向的改革文学创作,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遭遇了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波折。

关键词:《沉重的翅膀》;张洁;改写;批评压力;艺术追求

中图分类号: I2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5-0185-05

《沉重的翅膀》是第一部以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改革文学潮流中带有标志性的重要文本。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给张洁带来了褒奖与荣誉。但它并非一经发表便得到各方认可与赞赏,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批评促动到改写之后才被认可的曲折过程。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授予的是《沉重的翅膀》的修订本,而不是最初的版本。“一九八二年三月到四月举办的首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初评推荐书目中《沉重的翅膀》就名列前茅,最终未能通过;第二届读书班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初评时又被一致推荐,后经评委投票获奖。”^{[1](354)}修改与否,与荣誉直接相关,更关系着作家的政治处境。《沉重的翅膀》的修改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事件,“在我国文学艺术出版史上,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出书后,还作如此重大的反复推敲和修改,实在罕见。”^[2]《沉重的翅膀》反映出了时代负累的沉重与社会转型的艰难,而小说的“沉重”改写,也无疑为作家对社会现实表达被时代所束缚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没有好结果,这不完全符合生活实际。”^[3]也有文章指出:“小说把我们国家的一个部写得过于晦暗,问题是那样的多,积弊是那样的深,上上下下有那么多思想僵化、因循保守,心术不正、政治品质不好,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改革的干部……这个翅膀实在是太沉重了,究竟还能不能飞得起来?这使人不能不感到一种迷茫了。”^[4]习惯了“胜利”与“光明”情节模式的读者与批评者,显然无法接受张洁所展示的“沉重”。所以“大家建议作者做进一步的加工,修改,并相信作者能够改好这部作品”^[3]。其实,这种建议改写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依然是在用一个框子来衡量一部作品,必须要砍削掉它不合乎框子的地方,才能最终实现批评的价值效用。当然,这种对作者改写的建议并没有带有强制性,如果说这次座谈会上批评者出于“好意”的修改提议还带有商榷性,那么北京市文联对于《沉重的翅膀》的讨论则是批判性的。

与北京市文联第一次座谈会多方肯定张洁的小说相比,第二次会议的“腔调”里充满了否定。“会议氛围和上次完全不同,个个正襟危坐,庄严肃穆,发言者手拿着发言稿,一边倒的批判言词,显然是经过布置的,显然与当时已经传开的领导批评有关。”^{[1](353)}读者与批评者的欢迎,并不是一部小说获得终极认可的依据,有且只有相关的领导或负责人的意见,才是评判的最终尺度。虽然《沉重的翅膀》引发的风波与张洁的改写引人注目,但是从小说发表到一九八四年修订本出版这个时间段内,并没有出现公开发表的批评文章,基本上都是“当时个别负责人的严厉的口头

收稿日期:2014-04-28;修回日期:2014-08-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中的改革文学研究(1979-1985)”(13czw078)

作者简介:苏奎(1976-),男,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批评,说作品有‘明显的政治性错误’,是‘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的一个重要情况’,作者‘太放肆了’等等”^{[1](354)}。所以就出现了《沉重的翅膀》问世后前热后冷、先是肯定继而遭批判的局面,文学批评依然带有全凭领导个人主观判断与政治标准至上色彩。无论对于张洁,还是对于正在形成潮流的改革文学来说,这种“无端”的指责都会构成决定性影响,“这些,给这部小说的诞生,犹如一个新生婴儿呱呱坠地,是多么严峻的考验,多么沉重的袭击!……这些,给创作这部小说的女作家——张洁同志,给她的精神和心灵多么严重的压力,多么巨大的打击!”^[2]动辄得咎的批评环境,必然阻碍文学对于社会现实挖掘的深广度。

被定性为犯有政治性错误,对于刚从民族浩劫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虽然在《沉重的翅膀》的批判中,已经不再有上纲上线、组织批判文章围攻并上升到对作家的彻底否定的情况,但是来自政治的压力依然具有令人心惊胆颤的效力。在批判《沉重的翅膀》的会议上,会议的主持者还是在用原则与立场来指责那些肯定张洁的声音,“一些党员评论家不从党的原则高度帮助小说作者,这对于张洁这个预备党员没有什么好处”^{[1](354)}。当把党性立场与文学批评搅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用一种声音消弭众声的喧哗,从而实现政治标准的评判地位。而且,这种指责也包含了威胁性的告诫,如果评论者或者作家再“一意孤行”,那么自然会接受党的纪律处分,而对于预备党员张洁来说,她的预备期必然会延长。对于非常看重自己政治身份的党员来说,这种惩戒无疑是不能承受的,因为这与小说的创作初衷与评论者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张洁曾谈到《沉重的翅膀》创作动机,她说:“我所以写,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还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便不再写了。”^[5]良好的动机、被批判的现实,以及未知的境遇,使得张洁只能按照批判者的要求对小说进行修改,以规避政治上的“错误”风险。

一九八四年《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出版后,《人民日报》曾发表几篇文章肯定张洁的修改。周达的文章认为:“修订本不仅是增加了情节,丰满了人物形象,突出了主题,删去了不确切的议论,……修订本保留了初版的精华,而思想上、艺术上又有了明显的提高。”^[6]胡德培认为修订本“不仅文字反复推敲、润色,而且内容也有增删修订”^[7]。张光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序言也肯定了《沉重的翅膀》的修改效果,“经过大幅度的去芜存菁功夫,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8]无论是周达、胡德培,还是张光年的评价,都是基于修订本与《十月》杂志版之间的对比阅读,张洁在叙

述方面的调整与凝练,确实使小说在艺术层面上有一定提升。但是,这些完全支持修订本的评价本身就是对初版本的否定,所以基于作品完善角度的肯定,要远远少于针对张洁的“端正”写作态度,也就是党性原则要比小说的艺术完满更被时代的批评所看重。张光年说:“在中青年作家中间,一部长篇作品发表出书后,还下大功夫进行反复修改加工的,如今并不多见。这种艺术上认真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8]周达、胡德培等人的文章也鲜明体现了对张洁态度的肯定,“张洁同志在创作发表后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反复复地推敲、加工,扎扎实实地增删、修订是值得人们珍惜和肯定的。”^[7]政治态度要比艺术水平重要,所以修改这一行为本身就具备了价值意义,而且张洁接二连三的修改更体现出“积极”的姿态,这是政治化文学批评要求的效果。同时,当年对张洁修改行为的评价还着眼于作家的创作态度,认为这种认真的改写是“对读者负责任的表现,这种做法是值得赞许的”^[4]。张洁不仅积极地对小说进行了修改,而且在修订本出版后发表的《创作思想的新飞跃》一文中也承认了自己认识与创作上的局限,“我曾写过不同题材、不同内容的作品,但我最为关注的,却是经济战线的斗争,因此不自量力地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尽管书中写到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新人,也努力揭示一些弊端,却未能切中造成这些弊端的真正根源。”^[9]至此,《沉重的翅膀》修改的必要性因素全部齐备了,那么张洁“几乎改写了全书的三分之一”的行为便具有了无可置疑的合理性。

二

无论再怎么肯定张洁对《沉重的翅膀》的修改,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作家是在政治的压力下“采纳”改写建议的,这与“十七年”文学中作家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需要的改写并无二致。所以,抛开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在新时期的背景下,这种带有强迫性的改写不可能被作家、批评家普遍接受,也不可能成为可供借鉴与学习的范例。在《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出版后强大的肯定声浪中,也有否定这种修改行为与改写效果的观念。蔡葵在重读《沉重的翅膀》的文章中认为,张洁在政治要求下的修改未必是成功的,在他看来“初版本犀利而感伤,震撼力强,修改本则有磨平了的感觉”^{[1](354)}。朱文华对张洁改写的批评更为激烈:“我们如果把发表在刊物上的第一稿同单行本修改稿作比较,却可以发现后者在‘稳妥’

之中却较为明显地减弱了前者原有的锐气，由此留下了若干类似建国后十七年中某些反映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作品的公式的痕迹。”^[10]同时，他认为《沉重的翅膀》遭遇到的指责、非难，以及非改不可的压力，虽然只针对张洁，但是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会阻碍改革文学的深入发展。如果受“《沉重的翅膀》单行本修改稿的束缚，那也就不可能把‘改革文学’引入真正的繁荣。由此看来，‘改革文学’的突破的非艺术方面的前提条件是：作家当以改革家的姿态创作，评论家也要以改革的精神搞评论”^[10]。这种质疑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预示了批评声音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对照阅读《沉重的翅膀》的《十月》杂志版与一九八四年的修订本，虽然有多处的改动，但基本上保持了小说的原貌，未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张洁的修改没有完全依照批判否定的意见来修改，一方面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中很多观念是断章取义，甚至是无中生有，这就无法作为修改的参照；一方面张洁是听令改写，对强加于自己的干涉未必完全认同，抵触心理应该是存在的。即便如此，修订本再也没有遭遇责难与批判，因为最初的否定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到修订本年出版，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环境稍为宽松，再去纠缠一个秉持“端正”态度修改的作家，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过去。

价值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自然也会形成对于《沉重的翅膀》修改的不同态度，而且围绕这一事件的言论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九八四年前后发表的，因为距离太近而缺乏积淀与冷静审视，自然会带上不同程度的“偏见”。虽然我们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涉与纠缠，但是单纯地认可，或者简单地否定张洁的改写，都是相应的情绪在作祟，结果就难以客观。

修订本确实存在像蔡葵所说的没有了“初版本的犀利和感伤”，其强烈的震撼力也随之消失了。这种犀利感与震撼力，可能就是引来主流批判声音的根本缘由，修改这些“碍眼”的段落字句，是张洁整个改写工作的首要任务。例如展现改革者郑子云面对的困境，原文说：“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几乎是整个的社会。”这确实有放大改革阻力之嫌，不利于正向价值观念的生长，张洁做了改动——“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便是这个社会里，虽说是残存的、却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旧意识。”与这种含蓄化指向的改写相应的，一些言词比较激烈的表达段落直接被删去了，例如原文中下面这段话在修订本中就不见了：

就拿郑子云对待田守诚住房超过国务院规定标准，花了国家近二十万元钱给自己盖房子的事情来说，

他又是给部党组全体成员写了公开信；又向中纪委打报告，要求田守诚应该向全体职工公开检讨；又是要求田守诚退出不该多占的住房；又是要求处理办公厅那些置全部住房困难的职工于不顾、只给部长吹喇叭、抬轿子的干部……结果怎么样呢？上头来了个调查组，折腾一些日子，虽然写了个调查报告，又能把他怎么样呢？田守诚才不往心里去呢，这是什么上纲上线的原则性问题。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张洁意在以郑子云奈何不了田守诚为例，来体现整个社会的无原则状态，以及由此给改革带来的难度。显然，虽然犀利而能促人深思，但是在文学还拘禁在歌颂与暴露的固定思维中的时候，这样的文字无疑会成为批判的靶子。

在张洁的修改中，删除这一改写手段的应用对象，基本上都是比较激烈或敏感的语句或段落。例如，删去了郑子云的感慨：“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按着自己真正的面目生活呢？但那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人向往的事了。他已经习惯于这种面具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实，对于庞大的社会机器，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删去了不当议论，诸如：“界线，形形色色的，渗透在每一个缝隙之中。人们求助它，因为它可以挡住许多应正视却没有勇气正视的东西，而使良知处在心安理得的昏睡之中。”“善良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被颠倒的位置上。”“早已过去了，那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时期，然而，那种病毒却在一定程度上已渗透骨髓。”等等。砍削掉这些带“刺”的东西，才能表明自己对批判的积极回应，有且只有删除这些对于转型期来说犀利而敏感的言词，才能保证自己“过关”。当然，这是以减弱文学的震撼力为代价的。张洁对转型时代的沉痾痼疾的批判，是她的社会责任感使然，带有作家热情的痛切的针砭，要比那些盲目乐观的改革叙事更能引发读者的思索，张洁的改写无疑削弱了小说那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有违作家初衷的改写无疑是失败的，而且也会使《沉重的翅膀》丧失对改革文学潮的价值引领。

一九八四年修订本出版后，评论者主要着眼于张洁“端正”的态度而给予认可的同时，也肯定了小说修改后的艺术效果。艺术方面的精雕细作，应该是张洁的一种主动追求。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单行本之前，张洁曾对《沉重的翅膀》进行过“第二次”修改，也就是对《十月》版加以调整。这个时候虽有批评意见，但是还仅限于学术研讨的范围，充满政治色彩的严肃批判尚未出现，所以这次修改并不是批判的压力所致，而是为了使单行本更加完善。第三次、第四次修改，相对于合乎政治需要的改写，艺术效果尽善尽

美追求下的调整所占比例更大。也就是说,张洁对《沉重的翅膀》的修改,一开始就带有艺术角度的考虑,政治化批判下的改写要求,不过是人为地给了作者艺术完善的机会而已。

三

《沉重的翅膀》艺术上的突出特色是叙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张洁把对人物、事件等方面的认识与判断直接用议论性的话语表达出来,使小说具有了哲理性与思辨色彩。然而在原文中,并不是所有的议论都是恰当的,在一些议论性表达中,“作者的介入,是与整个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思绪流动扣合不紧的,或者干脆就是游离的。这部分的议论大多是政治性的,……包含着一些过头的、甚至错误的东西”^[4]。对这些偏离作者本意的议论性文字的调整,是整个改写工作的重要内容——有的议论被直接删除了,比如“当不正常的现象,比比皆是的时候,正常的现象,反而会被视为反常、谬误。‘大多数’,有时比真理更强大。”“全国能有几个张志新呢?出类拔萃的人,不论在人类历史上的哪一个阶段,永远只能是一个少数。报纸登过了,广播剧演过了,诗人颂扬过了,而真正能够认识到张志新这个人物之所以出现,其复杂、深刻的背景、现实以及未来的意义的人,究竟占十亿人口的几分之几?”这些议论不仅抽象,而且比较敏感,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另外,原文中有的议论拖沓冗长,基本没有可读性,而且使行文显得沉闷,比如作者用万余字连续性地呈现了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条文的罗列与繁琐的说教,让人读后如同听长篇大论的报告一样难受。这显然与张洁意在体现改革者郑子云的理论水平、勇气与担当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在修订本中这一万多字就彻底消失了。《十月》版与修订本之间最鲜明的差异,就在这些议论性文字上。张洁的修改对于生活场景的描述,比如工厂生产、人物情感、家庭生活等方面,基本上保持了原文风貌,而对于议论性语句段落几十处的删减调整,体现了改写的重点所在。对于议论性文字的修改虽有磨平小说“犀利”的遗憾,但一些改写确实使文本的艺术水准得到了提升。

张洁的修改在做“减法”的同时,也在需要突出的地方做了“加法”。与删减内容相比,增添文字对于主题的深入、人物形象的丰满等,更有建构性意义。修订本中增添出来的文字,比较多的是在展现“翅膀”的沉重,可以看出张洁的意图所在。《十月》版中但凡

涉及改革负累的地方,张洁基本上都会增添文字,以凸现“沉重的翅膀”。比如,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原文的规模仅有四百字,改写成了一千余字,突出了计划工作模式的不合理性与改革的必要性。张洁增扩了对改革者陈咏明所处具体困境的表述内容,改变了原文只宏观而抽象地指出他的改革事业遭遇阻碍的叙事。在修订本中张洁给陈咏明增添了很多“困难”,使那些偏于对体制追问的指向,转而偏向了对现实困境的描述。通过改革者陈咏明的遭遇与感受,体现出小说“沉重的翅膀”这一主题。张洁的这种改写取向,渗透到了陈咏明工作的每个场景中,比如,郑子云找陈咏明谈话,准备派后者去曙光汽车厂任厂长,在修改稿中,增加了郑子云对工厂困难现状的介绍。这其中包括:生产连年的亏损,生产管理的无序,职工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托儿所都不具备正常运转的设施与人员,食堂乌七八糟,医务室脏乱差,几百名待业子女没法安排,等等。增加的这一段内容一方面强调了计划体制的不合理,一方面也意在展示陈咏明所要面对的烂摊子。张洁给陈咏明增加的这些“难题”,不仅有宏观上思维观念与体制的束缚,而且也有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陈咏明不能逃避,只能面对。摆明陈咏明的困境,要比纠缠于意识观念的抽象议论,更容易让人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

虽然《沉重的翅膀》的修改是在政治压力之下进行的,但是在删除那些“犀利”言辞的同时,她所增添的内容则起到了使主题突出、人物性格丰满的作用。与着眼于内容相应的是,张洁也很注意艺术形式上的修改,推敲段落措置、语句顺序与用词,是她改写工作的另一个重点。这种修改其实是对文章的润色,使小说语言表达准确、有文采,《沉重的翅膀》是张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在主题、结构,还是语言形式上,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来自政治要求的修改,那么很可能表述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就会一直保留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沉重的翅膀》被动性的修改,却成全了艺术上的完满,这是一直质疑这种修改的批评者所没有注意到的。对比一下小说的修订本与《十月》版,就能很明显感觉到修改后的语句,精炼、准确、生动。以小说开头第一句话为例,原文是:“让我们从这个普通人的这句朴素的话里,得到超度吧:——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修订本中只剩下了“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删掉前半句,不仅没有影响表达效果,反而使语句凝练而有张力。类似这样的改写很多,比如,“一听见这声音,叶知秋总是不放心。”在修订本中这样表达:“这声音总是让叶知秋感到不放心。”原文中

的“一”与“总是”之间是无法搭配的，修改后避免了这种语病问题；比如，工人杨小东说自己是个“粗人”，修改后变成了“粗粗拉拉的人”，前后两个词语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粗人”是没有文化的人，而“粗粗拉拉的人”则指不敏感不在乎细节性格粗放的人。从小说中的具体语境来看，后者才符合杨小东表达的意思，这种修改就有纠正用词错误的意义。

四、结语

张光年在为《沉重的翅膀》作的序言中指出：“改革难。写改革也难。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或者说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就连描写这种在斗争中起飞的过程，也需要坚强的毅力，为摆脱主客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8]描写社会改革沉重的张洁，在创作上同样背负着“沉重的翅膀”，这说明社会转型期，文学也必须突破自身与外在双重障碍的限制，在变革中寻求适合的生长环境。张洁对《沉重的翅膀》的修改，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事件，体现了新旧交替时代，作家无法回避的政治规约。《沉重的翅膀》不仅是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收获，张洁对其修改重写的影响也就超出了个体范畴，而具有了广泛性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改革文学的发展样貌。因为评论者的立场或价值观念不同，对《沉重的翅膀》改写的态度迥异。在笔者看来，如果单纯从艺术完善的角度来看，以上几方面的修改是有其必要性的。然

而，作家对作品的修改工作，应该放在小说正式发表之前，而不是发表之后，更不可以反复修改，以至于一部小说出现了几个版本，造成阅读与评价上的混乱。

注释：

- ① 在《沉重的翅膀》修订本的文末列出的撰写与修改信息如下：“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脱稿；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二次修改；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第三次修改；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第四次修改。”第一次修改，张洁并没有提及，这个时间应当是小说在《十月》发表之前。所以虽然张洁说修改“四次”，但是发表之前的修改，并不应该计算在内，而一些评论文章中的“四次”修改，是完全采纳修改本文末信息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蔡葵. 沉重的话题——重读《沉重的翅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 [2] 胡德培. 艺术魅力的秘密——《沉重的翅膀》为何受欢迎[J]. 当代文坛, 1985(4): 15-16.
- [3] 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沉重的翅膀》[N]. 文艺报, 1982(3): 25.
- [4] 陈骏涛. 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N]. 文艺报, 1982(3): 18-25.
- [5] 张洁. 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 [J]. 读书, 1982(3): 81-85.
- [6] 周达. 《沉重的翅膀》修订本[N]. 人民日报, 1984-11-14(8).
- [7] 胡德培. 难能可贵[N]. 人民日报, 1984-8-6(7).
- [8] 张光年. 《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序言[N]. 文艺报, 1984(9): 12-13.
- [9] 张洁. 创作思想的新飞跃[N]. 人民日报, 1984-11-26(7).
- [10] 朱文华. 关于“改革文学”的几点思考[J]. 学习与探索, 1985(3): 103-110.

The “heavy” revision of *The Heavy Wings*

SU Kui

(Faculty of arts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Zhang Jie's *The Heavy Wings* first appeared in the fourth, fifth serial publication in the magazine “October” in 1981, and the booklet published in 1984, for which Zhang Jie made its three revisions. Although there is no change in “beating” and you will not be the last “beyond recognition”, the revision work itself reflect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features. Zhang Jie did so for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but more or less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from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the changes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dream of reform tend to anticipate the trend of history literature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hich people have suffere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peculiar twists and turns.

Key Words: *The Heavy Wings*; Zhang Jie; rewritten; criticism pressure; artistic pursuit

[编辑: 胡兴华]